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

(二)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大量翻印古籍

谭其骧

中央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党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视，读后令人万分感奋。怎样才能很好地贯彻这个指示呢？我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大量翻印古籍。

翻印古籍的目的之一是保存古籍；而保存古籍，正是整理古籍的基础。若古籍不能保存而任令散失，哪里还谈得上整理？在旧社会里，书籍由于遭受天灾人祸而不断有所亡佚，这是不足为奇的。不幸的是解放以来，古籍的散失不但未能制止，并且十分严重。前些时候看到杭州大学陈桥驿同志的统计，绍兴地区方志类文献可考者原有146种，而现在能查到下落的仅有72种，其中不少一部分都是解放前还有人看到，而现在已不知所终了。一方如此，推想别处多半也不会相差太远，那末全国一共该损失了多少？

古籍之所以会失传，主要是因为有些书传本太少，甚或只有一个“孤本”，一遇事故，这一个或几个本子一遭殃，这部书就彻底被消灭了。过去书籍流传靠传钞，靠木刻刷印，传本不可能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但现代的印刷技术比旧时代不知道方便多少倍了。在现代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把所有传世的古籍全给翻印一次（当然也可以多次），多则印上几万部，少则印上

几千部，让它们无远不届地传布开去，那就纵使遇上绝天的夫灾人祸，也不可能失传了。我们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可是过去三十二年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以至浩劫一来，多少种古籍就难逃劫运了。

翻印古籍的目的之二是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适应当前和今后广大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典文学、哲学工作者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培养青年一代的古籍整理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研究祖国古代文化的青年当然会越来越多。他们都得攻读古籍，有些不常用的可以向图书馆借来看，但有些基本书自己不能不有一套。如专攻唐诗的总得有李、杜、元、白等几部集子，专攻秦汉史的总得有一部前四史，专攻先秦哲学的总得有一部诸子集成，等等。至于准备搞古籍整理工作的，当然也得多看几部古籍，把古文真正看懂，对古代史事和典章制度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才行。要做到这样，也得自己有一些书经常翻阅，不能光靠向图书馆借。

可是现在各地书店里的古籍奇缺，根本没法满足这些青年的需要。线装木刻本已极为稀少，不仅价格高得惊人，并且一般根本不卖给个人。解放前商务、中华等书局出版的已越卖越少，所剩寥寥无几。而解放后所印的不仅品种很少，印过的也由于印数太少，书一上市要不了多少日子，就销售一空。所以如今的青年人有志想钻研祖国古代文化，买几种古籍的实在很可怜，任你东奔西跑，根本买不到所需要的书。我有一些熟识的青年，有的想买《史记》，有的想买《通鉴》，有的想买《水经注》，有的想买《读史方輿纪要》，都买不到。这几种还都是解放后印过的。至于有的想买解放后没印过的《文献通考》，那当然更是妄想了。前些日子有一位侨居海外数十年的华侨回国见访，谈起此事，他不胜骇异，无限感慨地说：“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竟买不到一部《史记》，这那里象是在中国！”但这是事实。

市上的古籍这样少，我们怎么可以指望青年能够继承发扬祖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就是想培养一批青年日后能承担起整理古籍的责任，在培养过程中若只发一些讲义而不给他们古籍原书阅读，也是培养不好的。

所以我认为首先得大量翻印古籍，才能大规模地展开整理工作，才能组织、培养起一支可观的队伍来从事标点、校勘、注释和今译。

据最近到过日本的朋友说，日本市上有很多台湾翻印的古籍出售，连地方志都几千部、几万部地印。台湾做得到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单靠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能力量不够，可以多安排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嘛！国家出版局应该真抓一下。

我国现存古籍据估计约在十万种以上，建国三十二年来经过整理出版的只有二千多种。这个速度实在太慢。再这样下去，恐怕新印的速度还赶不上散失的速度。今后应该先尽快大量照原书翻印，最好影印，也可以排印，每一种印数不必太多，但品种应该尽可能多。挑价值高传本少的先印，一年印它一二千部，也得十年二十年才能印上一二万种，古籍的精华也许差不多了。一面翻印，一面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展开整理工作，估计要把一二万种都整理出来，没有一二百年是不大可能的。但诚如陈云同志所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到底”。

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

周汝昌

古籍整理，关系至巨，这项工作也到了非“抢救”不可的时候了。

一个民族，必然有她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文明。没有了这个，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就是“成其”了，也不能长久存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文化财富，存在于不同的“形式”之中，但古书无疑是这些“形式”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大“库存”。所以，古书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全民族的事。只要不想让民族文化传统中断（关系到民族继续生存！）必然要大力重视古书的保藏、整理、流布、运用，……等一系列问题。

要想做好古籍整理工作，这个认识工作其实是最根本的一条，先得把它做好才行。不然的话，如果到哪天又有人提出来一个什么理由，说是古书尽是害人，还是“封”字号的毒素，只能进造纸厂，不能整理——那就不但前功尽弃，一切都谈不到了，到那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就更危险了。所以，坚持这个认识，即后起一代如都读不懂古书，民族文化势将中断，民族生存势将岌岌可危，因此亟须对古书做好整理工作——坚持这个认识，并使每个人都具有这个认识，是做好这项工作的根本措施。

然后，就要发挥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是，必须统一调度全局的人力物力。由中央成立领导小组，调查全国的力量和条件，加以最合理的统一安排，通力协作。非如此，要靠个人或个别单位去零敲碎打，那是旧社会的现象。试想，当年一个中华书局，

能整理排印一部庞大而高质量印制的《四部备要》，至今仍为学人所利用，难道我们今天新中国国家力量反而比不上一个解放前的旧中华书局吗？

第三，要订出规划，监督落实。解放后的中华书局，除了二十四史一类（那还是毛主席亲自关怀指示的，人人皆知），基本上没做出别的大型整理工作。我们不能光是等待中央领导同志出一个题目，才做一件“答卷”。难道不应该本着那个精神，立即拟出当前的和长远的规划吗？——如果是已然做出过那规划的话，不是可以和群众见见面，“公之于世”吗？公之于世，不但可以引出有益的批评建议，使之更臻完善，而且它本身便是一种宣传、促进的重要步骤。

这种工作，出版行政部门应该进行，不能总是听了中央领导同志讲了一回，这才被动地行动，是不是可以积极主动地做一番为民族为国家的大事业呢？

第四，要成立专职的出版、印刷机构和逐步兴建专职印刷厂。这涉及专业性的一系列编、校、排等工序上的相当可观数量的有专门知识的工作人员，并非是拉过任何一个人就能代替和胜任的。举最易见的例子，《资治通鉴》里就把“正字”（官名）加上了书名标符（因为它跟在五经四书等一串书名的后面），北京有家出版社出的书，有一处竟把“篋衍”这个词语拆散，中间点断，把“衍”字弄到下句去（也读不通呀！）这些问题，举之不尽。非专业编校，怎么行呢？

第五，精通古书的，大抵已是年岁大的人了，需要助手，也应当带出徒弟。这些助手和徒弟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建议及早成立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培育人材。培育过程中就以整理古书作为具体的“课程”，一边教，一边作。继往开来，莫此为要。

第六，借鉴和运用海外的整理成果，不要闭塞自封，少走弯路。这也必须有一个专门班子，向海外侨胞、外国友人专家学者去调查征询，请教求助。

第七,我要特别说一句,这项关系中华民族的大业,盼望早日能由大陆与台湾的专家们通力合作,为振兴中华、为子孙后代做好这一意义重大的工作!

以上粗举大端,当然不很全面,细节更不遑备及。谨以此文,抛砖引玉,大家都来献计,则胜业指日可期,民族传统文化幸甚矣!

我对于古籍整理不成熟的意见

谢国楨

我非常拥护中央关于古籍整理的指示。我认为北京图书馆是度藏祖国文化的宝库,为了传播祖国的文化遗产,提供国内外人士的探讨和研究,先哲遗泽,不致于失坠;又可以协助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提供宝贵的资料,是责无旁贷的。我本来是北京图书馆的成员,既承垂询,虽然是识力棉薄,一知半解,也是义不容辞的。谨就我知道的,也是实际可行的具体措施,计分为四项条陈如下:

(一) 就北京图书馆特藏组善本室的藏书,和柏林寺分馆线装书库中的藏书中有颇多的好书,和外间未发现的秘本,在柏林寺普通书中如明末在广东阳江、恩平一带抗清的民族英雄连城璧所著《蹇愚集四卷》就是罕见的孤本,亟应编印传播。因之整理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的善本和罕见的书籍,可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北图的善本书籍于宋元佳槧、名钞稿本、珍贵的地方志和有裨实用的资料书籍极多。我的建议是选择馆藏有代表性的佳槧名钞,可分为若干集影印或编制为北京图书馆丛书或单刻,印刷要务求精善,足以向国内外说明,党和政府对于祖国文化传统的重

视,同时可供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探讨和研究;亦可供一般文史哲爱好者的阅读。

(二) 专业和专科学研究的图书。就史部而论,解放前北图对于我国舆地边疆的书籍,曾编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内容是专门编辑明代边疆和外国史乘罕见的传本,我曾与其役。又如馆藏的金石名钞稿本,我曾编有清吴大澂《吴宥斋尺牍》七册。久已编印行世,早已绝版。解放后赵万里同志领导善本室同志编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册,《中国版刻图录》八册,读者便之。近年郭绍虞同志主编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北图藏书,种类繁多,此类工作,宜当仿效,继起有人,当后来居上。

(三) 自十年浩劫以来,书籍多经散佚,印刷停滞,当此发展祖国文化之际,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来研究某项学科,人们都感觉书籍的缺乏。那末,普通应用之书,也应该选择编印。研究语言文字学之书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阮元《经籍纂诂》等;研究元明以来的历史、基本常识之书如《元典章》、明焦竑《国(明)朝献征录》、清图理琛《异域录》、清魏源《圣武记》、《海国图志》、夏燮《中西纪事》、王之椿《国(清)朝柔远记》、王弼《华英通商事略》、印光任《澳门纪略》等,都应赶快编印。

(四) 普及通俗的读物:(1)选取古书中的精华;(2)编成历史性的传记,以文艺性的笔墨写成传记文学;(3)古书的今译,如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书,删繁就简,采取其精华有趣味、有意义的故事,编成现代的语体文,增进了人们历史的常识,必然受到读者的欢迎。

以上四项,虽然是肤浅的意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那样容易。我建议组织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和邀请熟于版本目录学的人士,组成一个小组,进行这项工作。

以上意见说的不一定对,还请负责同志们参考。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记于北京团结湖北里之瓜蒂盒。

建议编辑《中国古籍现存书目》

汪长炳 潘天祯

我国历史悠久，流传下来的古籍之丰富，世无与伦比。从《汉书·艺文志》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公私藏书著录的书目著作，品种繁多，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限制，极其分散，不可能编成一部全国藏书的总目录。因此，古人谈论我国的古籍数量，只好用“浩如烟海”、或“汗牛充栋”来形容其多，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其种数。建国以后，有人根据所见书目估计说是八万种，有人又说是十万种，也有人说有十五万种，得出极不相同的数字。现存古籍究竟有多少种，至今仍然没有比较准确的数据。至于具体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和收藏在那里？由于没有进行过全国总登记，自然没有一部全国现存总目可供查找，这对整理古籍、开展科学研究都是极其不利的。

现在，全国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协作，做到全国一盘棋；而现存古籍基本上都收藏在各系统的图书馆、资料室里，是人民的公共财产，数量之大，是历史上没有的。即就省、市、自治区图书馆来说，一般都藏有古书几十万册，多的竟达一百多万册；就一个省来看，江苏省的公家所藏古书，在四百万册左右。国家的统一，藏书的集中，都是前人所不可能有的条件。因此，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趁老一代人尚在的时机，由国家统一组织编成一部质量较好的《中国古籍现存书目》，为有计划整理古籍打好基础，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条件，为后代人查考准备工具，都是十分必要而且有可能实现的。

要编好一部《中国古籍现存书目》，业务性既强，工作量又大，牵涉的面也很广，当然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要研究讨论的问题不少。根据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我们以为要着重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一、在中央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强有力的领导下，要建立一个人数不多、作风正派、既懂古书编目业务、又有组织能力的专门班子，负责编目的具体组织工作；二、要大力培训一批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知识、有比较顺利地阅读唐宋人文章的能力、基本上掌握古籍编目特点的干部队伍，各省都要有，这是保证编目质量，顺利进行工作的关键；三、由于历史原因或帝国主义的掠夺，我国古籍散佚在国外的不少，要通过各种渠道复制回国，寄存国外的要收回；四、邀请台湾省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士参加编目，共同为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古籍现存书目》贡献力量。

关于古籍整理的几点意见

肖璋

党中央关于古籍整理的决定和指示，我非常拥护。现在就这个工作提几点意见：

一、要有“树人”思想

中央领导同志说：“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话抓住了这个工作的特点。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文字艰深，要在短期内能完成标点译注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事，势必非用几十年的功夫不可，这是客观情况注定了的。既然作长期努力的打算，就要积极创造条件，否则还是不能完成。条件是什么？首先是积极培养大量专门人材，而且代

代培养下去。这就要求领导有以“树人”作为首要问题的思想。所谓首要问题，并不是说非得等人材培养出来以后再开始搞标点译注，而是说目前标点译注工作的摊子不宜铺得太大，主要精力要用在培养人材上，工作随着人材的培养逐步展开。这样，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规划才能落实，才能保证完成。如何培养人材？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要因人制宜，因地制宜（指学校、研究所等机构）。说到“树人”，就牵涉到老先生的使用问题。我觉得今天整理古籍，如何发挥老先生的作用是关键。老先生可以亲自标点译注古书，也可以培养标点译注古书的人材，哪方面对这个工作利益更大呢？我看，若考虑到长远利益，那么把老先生的主要精力用来培养人材更为适宜。因为老先生埋头于搞标点译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势必受到影响。老先生不可能在生前把全部古书标点译注完毕，如果后继无人，今后又由谁来继续完成这一工作呢？道理是很清楚的。当然，有的老先生可能自愿参加整理古籍工作，并愿在工作中培养这方面的人材，那也可以，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少一些好。

二、要有轻重缓急之分

我国古籍既然浩如烟海，种类又百科俱全。为了配合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整理古籍要分轻重缓急。譬如哪些古籍最重要，应该首先标点译注出来，让一般广大群众能够阅读，又有哪些在某专业中很重要，应该首先标点译注出来，让从事某专业的人能够阅读；又譬如古籍中哪些是译注咸宜（如散文），哪些是宜注不宜译（如诗歌骚赋骈文等。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哪些是不值得译注，凡此等等，都要集思广益，初步规划，先有个大致的轮廓，以后从实践中逐步完密。总之，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各自为政，一拥而上，不顾一切，争先为快的混乱局面。

三、要特别重视质量

整理古籍既是长期工作，意义又非常重大，就须既积极又稳妥地进行，就须特别重视质量，不能一味追求数量。不但标点译注如此，就是翻印古书（这个工作不能废）也如此。要严格选择（包括版本），不可泛滥。古书读不懂，固然不好，读而理解错了，就更不好。标点译注就是古人章句之学。古人讲章句，虽不包括翻译，实际在串讲句子时有的也近于翻译。其中有许多方法对我们翻译古书是有帮助的。至于字词注释，汉唐学者都遵循条例，非常谨严，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汉唐以下的古书注释，有的也有可取之处，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就是一例。至于译注这些本有注释的古书，则更应该认真研究原有的名注的内容，反复思考，窥其用心，贯通后，再下己见。这都和提高质量有密切关系，应该大力提倡。

以上三点意见，很不成熟，提出来以供参考。

关于整理古籍的一点意见

赵光贤

最近中央提出整理古籍的问题，这的确是关系到我国古代文化能否长久保持下去的大问题，对于这样的巨大工作，必须有一个经过大家深思熟虑、反复讨论而定下来的全面的规划，对于当前在搞这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考虑周到，千万不要轻易上马。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是不是所有古书都要加以标点、注释和今译？是不是所有古书都有这样整理的价值和必要？这样做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我简直不敢想。如果说不是所有古书都这样做，要加以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首先必须定下一个要加整

理的书目,如果不是这样,抓到一部就搞一部,那就是无计划的乱搞,成绩不会是令人满意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搞这个工作必须有一班人,有的书需要专家,现在能干这工作的,大概都到六、七十岁了,四、五十岁能干这工作的恐怕不多。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能丢下本职工作来搞整理古籍吗?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恐怕只能作顾问或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了,因此有计划地培养整理古籍人才,作为搞这项工作的主力是当务之急。我建议办一个或几个(在不同地方)训练班,招考一批专业人员,不限年龄和资历,经过一年或二年的训练之后,即可从事这项工作,第一期毕业,再招第二期,如此分期分批进行,数年之后即可得大批专业人员。对这些专业人员要给一定职称,使其安心工作下去。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由各大学文学、史学各系成立古典文献专业,从大学一年级起作专业训练,四年毕业,对他们除专业知识外,还要求有一定的历史、文学知识,没有文史基础,专业训练必然搞不好,这是一项从青年中培养专业人员的根本措施。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当开办,文史系各专业之间,不要搞得太死,应许可其转业,俾能尽其所长。

我国古籍浩繁,方面甚多,专业人员中应逐渐进行分工。有的书比较容易注释今译,有的则甚难,如十三经之类,不先作校勘、训诂工作,则不能作今译,即令勉强作出,亦不易令人满意。还有些专门科学,非专家不能做,这些问题都应慎重考虑。

搞古籍整理,印刷亦是一大难题。自简化字出现之后,一般印刷厂即废繁体字而不用,今天能印繁体字的印刷厂已寥寥可数。将来印行整理后之古书恐怕要繁简二体并用,即原文用繁体,注释、今译可用简体;如二体并用,今天的印刷厂都做不到。在这方面必须有充分准备。

总之,这项古籍整理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很复杂,要作好全面规划,作好充分准备,工作才能做好。以上所谈不过一时想到的,挂一漏万,谨供参考。

一 些 建 议

朱士嘉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而且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版刻复杂,传布之广,遍及全球;对它进行整理、标点、注释和翻译(译成现代语气),必须动员各族人民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编辑、读者以及包括各种学术团体在内的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制订规划,经过长时期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有步骤有方法的艰苦努力,才能取得成绩。

现就管见所及,提出具体措施如下:

一 在中央规划小组领导下,拟订整理古籍切实可行的近期的长期的全面规划。这个规划最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争取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广大群众的支持帮助,争取国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帮助。台湾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欢迎他们回归祖国,为完成更大规模的整理古籍的光荣任务贡献力量。

二 选编急待整理出版的古籍分类书目,注明书名、卷数、著者、版本、收藏单位(附索书号)以及必要的参考材料。

在选编上述目录的同时,还要选编用我国各族文字编写的各类专著的目录。

三 散失于日、美、英、法、德、意、俄、荷兰以及其他各国各地

区的希见的中国古籍,不在少数,也应及时搜访、编目,进行复制,以飨读者。

四 占古籍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地方志(现存八千多种)如何整理出版,可商请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召集有关专家、学者,会同各省省志办公室和市志办公室共同研究,拟订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另外,我已编有《日本各图书馆所藏稀见中国地方志目录初稿》和《美国各图书馆所藏稀见中国地方志目录初稿》,这两份目录,可供进一步搜访、复制希见方志的参考。

五 建议教育部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怎样迅速而有效地培养大量的具有直接阅读古文献能力的接班人,对其中学习成绩特别好的给以物质的和精神的鼓励。

古籍整理与培养人才并举刍议

杨廷福

经历十年动乱,深怀我国文化中断之杞忧,而古籍整理系斯文于未坠,为子孙计高瞻远瞩,欣慰莫名,当竭尽生平,冀有涓埃之献。我国古籍浩瀚,举世莫与伦比,至于如何整理,全国文史学者闻风景从,献计献策,假以岁月,必有大成。惟如何使文化不中断,则培养有文化教养之后来人,读书种子无匮乏之虞,与造就一批古文献专业之人才,实为当务之急。故古籍整理与抢救人才,抢救文科教学似宜并举齐驱,二者相辅相成。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制约,互为因果,未可轩轻。但无可讳言,多年来学校教学重理轻文,而文科复处于“左”之干扰下,漠视文化遗产,以致后继乏人。然而作为伟大中国之人民,当具有一

定文化知识，似应略知祖国历史文化。奈何学生茫茫然者居多，即以文科论，学有根底、所资深者亦日益寥落，忧国者仰屋兴叹。揆其原因，社会上不予重视，而关键在于中小学语文、历史之教学、教材。

或谓：“古文难读”，“今学校课程多，无暇及此”。答曰：“否”。然则，何故六十岁左右由学校出身之同志，大都能阅古书，而今大学生则大都看不懂？何故老一辈科学家一般于祖国历史文化有所了然，或者娴悉并能赋诗填词，而今之中青年科学家固精深专业，然于历史文化有修养者似不多见。六十左右同志，三、四十年代正在校求学，当时国、英、算、数、理、化，加上音乐、美术、劳作、体育，课程视今略犹繁重，而昔能览古文，今则不能，问题在于语文、历史教学。按《论语》凡 13700 言，《孟子》共 35400 字，其篇幅当报纸五、六版而已。今自高小迄高中七、八年间，如能由浅入深诵读古文一二百篇，此要求并不高，童而习之，进而理解，似已具有阅读一般古书能力。故读古文并不难，至于培养成专家则又当别论。若干年来文科颇有不读书之通病，教师、学生水平惊人下降，此为文化中断之最大危险。此古籍整理之同时，切实改进语文、历史之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编选，并在中学增设祖国文化课，此不宜忽视者一。

古籍整理须胸罗万卷，博稽众考，为一艰苦复杂之劳动，历来为少数学者之专业。上海人文荟萃，古籍整理工作者仅百名左右，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以我国十亿人口之比例衡量，诚如沧海一粟，况老成逐渐凋谢，青黄不接，日见萎缩乎？因此，亟应仿北京大学古代文献专业例，于有条件之高校增设此类专业或恢复无锡国专之类学校，则二十年、三十年，可以“搞到底”矣，此其二。

古籍整理，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斯宏图，继往开来，非组织较大队伍无以奏其功。今全国有关单位与高校从事于古文献专业者本

已不多，况另有科研与教学任务，坐拥书城，文债之台高筑，不遑宁处。故社会上闲散之学有素养者，应作调查，亟待抢救，庶几发挥所长，不应借故留难，此急需政策规定者。退職、退休之大中学语文、历史教师亦应聘请参与，则群策群力，大有希望，此其三。

“左”之流毒，贻祸无穷，对文化遗产具虚无主义倾向者，尚不乏其人。从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入手，宣传中华民族之悠久历史与优秀文化以及古籍整理之重要意义，广造舆论，引起社会重视，亦为必要，此其四。

古籍整理与百年树人，目的在于不使文化中断，二者不可分割，称实陈言，谨议。

彝族古籍急待整理

〔彝族〕刘尧汉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对中华民族文化都有贡献。贡献有口头传授的，有文字记载的。司马迁《西南夷列传》、樊绰《蛮书》，主要是根据西南地区彝、白各族先民的口传记载，并无民族文献根据。

滇、川、黔三省彝族民间藏有大量的彝文古籍，解放前后搜集了六、七百卷。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六十二卷，民族文化宫藏六十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语文研究室藏量不少，都是解放后搜集的。解放前，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都有收藏，以北图所藏最多。今年暑期，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彝文组，延请滇、川、黔三省的彝老来京对彝文古籍进行初步整理翻译。查明北图藏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历史类四十七卷、历算类三十七

卷、哲学类(包括占卜)三十三卷、文艺二十八卷、宗教巫术及祭祀等各类三百九十一卷。当前应趁这几位彝老健在,急宜让其带领具有中外历史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青壮年,对这些彝文古籍继续整理,区分其精华和糟粕,先就每一类选译具有学术价值的一两卷以作样本。

在北图藏彝文古籍历算类三十七卷中,未必全属彝族固有的特点,也未必全属科学的作品;而在宗教巫术各卷帙中,也未必全属迷信。例如,今年春夏我在四川凉山工作期间,函请中国科学院天文史专家陈久金同志和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副教授卢央同志(彝族)到凉山,同我一道调查了彝族天文学,查明它在中国科学史乃至世界科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我们合写出《彝族天文学史》一书(经云南人民出版社列入今年出版计划),其中的恒星图就是从宗教祭祀的迷信活动中获得的;其中科学性很高的太阳历,也是存在于观察北斗星以占卜吉凶的迷信活动里。在北图所藏彝文古籍的宗教迷信类里,会包含着很有科学价值的东西。我们为写《彝族天文学史》,对贵州著名的主要讲天文的彝文古籍汉译本《宇宙人文论》(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作过一番考察;如果不具备天文学知识,就难辨明它受汉族天文学的影响很深,也难看出它保留彝族特有的、相当科学的一种阴阳历。

彝族的阴阳历和太阳历^(注),在世界历法史上独居一格,两者在今后对改革世界历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将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因此,应当注意北图所藏大量彝文古籍中含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宝藏。若不及时选译出一部分来,任其积尘,年久风化,这对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将是一大损失。

注

详论见《世界天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彝族太阳历》一文,将在云南《民族学报》集刊 1982 年刊载;简论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季刊 1982 年第 2 期。